

揖芬集

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

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揖芬集

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

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揖芬集：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/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. —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2.5

ISBN 7-80149-721-X

I. 揖… II. 张… III. 张政烺—纪念文集
IV. 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9732 号

揖芬集

——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



编者：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
责任编辑：光 知
责任校对：邵明君 闫晓琦
责任印制：同 非

出版发行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

网址 <http://www.ssdph.com.cn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排 版：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
印 刷：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16 开
印 张：49.125
字 数：1150 千字
版 次：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49-721-X/K·106 定价：1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 言

张政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。由于中华古史悠久，史料浩繁，今之治史者，一般不能不分断代。然而先生治史不分断代，读古书之博，可以追美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陈垣等前辈大家，兼之以丰富和精深的考古学、古文字学、版本目录学等方面的知识和造诣，故能以深厚的学力，对绵长的中华古史做贯通研究。先生尤擅长先秦史，也喜欢宋史。先生治学严谨，从不愿轻率发表著述，有的文稿甚至积压数十年之久。但一旦发表，必是发前人之所未发，得到同行的推崇，公认是厚积薄发的典型。学术界普遍认为，先生的学问，即使在同代的优秀学者中，也是出类拔萃的一位。

张政烺先生平易近人，谦逊宽厚。出于弘扬中华学术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先生期望尽可能多的学人从事此项工作，故以助人学问为乐，因而慕名前来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。先生不问亲疏，不惮烦劳，不计较自己的名利，宁愿牺牲宝贵的工作时间和精力，也要最大限度地满足求教者之需求，从来也没有在学问上给自己留一手。完全可以说，先生为了他人，特别是为后学者铺路，支付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虽然影响了先生的研究工作，却促进了几代新人的成长。这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浩劫、人文科学荒废多年之后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先生多年从事的研究课题，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，令人惋惜。我们将努力促使先生花费大量心血的学术成果尽早面世。

值此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之际，为了表示庆祝和对先生的敬爱之情，我们特别编辑了这部文集。定名“揖芬集”，是引自李白《赠孟浩然》诗“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”的典故。我们这些后学者，虽然在学问上不能望先生之项背，但先生的治学精神和道德一直在勉励和鞭策着我们。大家利用祝寿之机，发表各自的研究心得，切磋学问，这无疑是对先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弘扬中华学术的最好回报和纪念。我们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。

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

2001年10月10日



张政烺，字苑峰，山东荣成人，生于1912年4月15日。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。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，中华书局副总编辑，中国科学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，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
其主要论著有：

- 《平陵陈畧立事岁陶考证》，北京大学潜社《史学论丛》第2册，1935
- 《六书古义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10本第1分册，1942
- 《讲诗与咏史诗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11本，1942
- 《宋江考》，《历史教学》1953年第1期
- 《卜辞袁田及其相关诸问题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73年第1期
- 《〈金史〉校勘记》，《金史》第1~135卷每卷卷末，中华书局，1975
- 《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80年第4期
- 《十义二公及其相关问题》，《顾颉刚先生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》，1990
- 《读〈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〉》，《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》第1集，1991

<http://www.ssdph.com.cn>

ISBN 7-80149-721-X



9 787801 497215 >

ISBN 7-80149-721-x/K · 106

定价：

120.00元

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

委 员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曾瑜	白 钢	田余庆	朱凤瀚	吴荣曾	何龄修
李传荣	李伯谦	佟佩华	邹 衡	陈祖武	张永山
张守常	张福祿	林甘泉	俞伟超	高崇文	裘锡圭
谢桂华					

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辑组

成 员

张永山 谢桂华 何龄修 王曾瑜 吴 锐

目 录

前 言	(1)
张政烺先生访问记	陈智超 (1)
记业师张苑峰先生	张守常 (7)
我的老师张政烺先生	邹 衡 (13)
与张政烺先生谈对日抗战期间史语所的图书馆	石璋如 (15)
张政烺先生与古史研究	吴荣曾 (21)
我和张政烺先生的五次会面	〔美〕吉德炜 (25)
他把一生献给了学术——记张政烺先生的学术生涯	孙言诚 (27)
张政烺先生对甲骨学的重要贡献——师从先生问学忆往	刘 桓 (35)
追寻中国文化的根	严文明 (41)
山东章丘西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试析	佟佩华 刘延常 兰玉富 (45)
古玉研究的几个问题	安志敏 (57)
侯家庄 1001 号大墓的年代与相关问题	郑振香 (63)
商丘宋城和鹿邑大墓	张长寿 (77)
两周时期海岱考古遗存所反映的夷夏关系	邵望平 高广仁 (81)
晋侯墓地墓主推定之再思	李伯谦 (97)
中国古代都城礼制文化的形成	高崇文 (103)
汉代兵器二论	杨 泓 (115)
纽约出现的东汉青铜灯树考议	王育成 (125)
北宋时期的制礼作乐与古器研究	王世民 (135)
东夷系统的已佚古文字	俞伟超 (139)
论殷墟甲骨的埋藏状况及相关问题	刘一曼 (147)
羌甲探索	赵 诚 (165)
花园庄卜辞中有关祭祀的两个问题	刘 源 (175)
从一组卜辞看殷历月的长度和大小月的配置	裘锡圭 (181)
就甲骨文所见申说商代后期的徭役	王贵民 (189)
甲骨文所见晋南方国考	沈建华 (205)
记中村不折旧藏的一片甲骨刻辞	朱凤瀚 (213)

殷墟卜辞“𠩺凡虫疾”考辨	林小安 (221)
甲骨文“𠩺”即“曷”字说——兼谈羯的族源	赵平安 (229)
夏墟大夏考	罗 琨 (237)
说河伯	辛德勇 (255)
西周铜器断代研究的反思	刘启益 (261)
香江新见彝铭两则	张光裕 (281)
甲骨文金文“‘天’字族群”假说	吴 锐 (289)
谈济南市博物馆藏元年相邦建信君钺	吴振武 (305)
长台关楚简《申徒狄》研究	李 零 (309)
从竹简本《老子》、《缁衣》、《五行》谈楚简文字构形	曹锦炎 (323)
战国官印“尚路玺”考释	李家浩 (329)
临淄后李齐国陶文	王守功 许淑珍 (333)
新见布权试析	黄锡全 (349)
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“龙”字试释	刘乐贤 (355)
“天祖丞印”封泥与“天祖藏君”银印新考	林 沅 (363)
宋白玉“封”字印考	史树青 (367)
春秋岁星纪年管窥	张永山 (369)
论我国长城出现的历史背景	瓯 燕 (377)
略说先秦战争观念的演进	吴九龙 (385)
说张楚——关于“亡秦必楚”问题的探讨	田余庆 (389)
汉代吴越平原农业生产刍议	张泽咸 (403)
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形图城邑考辨	曲英杰 (413)
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	林甘泉 (421)
汉代司隶校尉考	许树安 (433)
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“西域传”所见西域诸国物产	余太山 (437)
论刘秀的人才观	张荣芳 (455)
说新——兼论年号创制之原因	廖伯源 (467)
唐代墓志中所见的高句丽与百济人士	赵 超 (485)
岳飞后裔考略	王曾瑜 (495)
辽代隶官州县的汉族地主	李锡厚 (509)
契丹小字《韩高十墓志》考释	刘凤翥 (517)
丘处机“一言止杀”辨伪	杨 讷 (523)
官箴、戒石铭与行政伦理	白 钢 (533)
元代的禳灾活动	陈高华 (539)
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	郑克晟 (547)
中国封建社会诸子均分制述论	栾成显 (559)
弘治初两京御史案	商 传 (577)

明代《处士杨公同室李氏寿藏》碑阴《山花一韵》解释和再译	徐 琳 (591)
《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》补正	何龄修 (599)
李自成禅隐夹山寺仅仅是个传说——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湖南分册》读后	王戎笙 (609)
李自成最后的归宿	袁良义 (619)
中黄子考——丁原植《文子新论》序	饶宗颐 (629)
《周礼》官联续论	宫长为 (631)
重读《讲史与咏史诗》	程毅中 (635)
刘氏校书考略	李解民 (645)
两晋南北朝之纬学——经学界的通纬风尚	吕宗力 (655)
《贞观政要》的流传与版本——兼驳日本学者的若干论点	谢保成 (671)
中庸之道与司马光哲学	漆 侠 (681)
论永嘉学派的历史形成	胡珠生 (695)
关于常州庄氏学渊源之探讨	陈祖武 (705)
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许刻本卷首彭元瑞题识志疑	梁太济 (711)
龚自珍事迹二考	樊克政 (719)
禹贡学会的复员及其结束	顾 潮 (725)
读书——顾颉刚在 1915 年	顾 洪 (733)
王献唐日记的文献价值	丁原基 (741)
林仰山及其旧藏陶量	李学勤 (759)
编后记	(761)
石璋如文图版	(763)
王育成文图版	(775)
史树青文图版	(777)

张政烺先生访问记

陈智超

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，苑峰先生讲授中国通史课的第一段，是我的第一位专业老师。后来苑峰先生调到历史研究所，我毕业后考入历史研究所作研究生，一直工作到退休，他以渊博的学识，惊人的记忆，对后辈的热情扶持，给我以多方面的指导与帮助。现在苑峰先生因身体原因不能直接教育我了，但他的风范与作品长存，仍然是我的老师。我不能忘记，大一时他带我们到周口店参观，对我们说过，他和朝鲜的金日成主席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2002年4月15日是苑峰老师九十大寿，谨将10年前的一篇访问记再次发表，为老师寿。

2001年元月

问：请您谈谈怎样开始您的史学生涯的？记得在北大时听您说过，这中间还有些偶然性？

答：这得从我上中学谈起。我在14岁时离开家乡荣成县到青岛上中学。当时正是新旧学制交替的时候。我就读的礼贤中学是旧制中学，四年毕业。毕业后如考大学，要先上两年预科才能进入本科。我在礼贤毕业后来到北京，上弘达中学当插班生。弘达是新制中学，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，我插入高二。弘达中学在西四大木仓郑王府的西院，现在的国家教委就在郑王府原址。

1932年我从弘达高中毕业，可直接考大学本科。我的志愿是上清华大学数学系。

当时各学校为了争取学生，考试都是错开时间举行的。辅仁大学最早，7月10日考试，我报了辅仁，也考取了。但我原先就不准备上辅仁，只是把这次考试作为一次练习。北京大学考试在7月20日，清华在7月底。我的一位同乡许维遹（字骏斋），这时刚从北大国文系毕业，知道我喜欢读古书，替我报考北大。报名费要3元，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既然报了，我也就去考，考场在第三院。

就在清华考试的前一天，北大在马神庙二院发榜，我竟录取了。

第二天我参加清华的考试，考场在旧国会，就是今天的新华社。第一场8点到10点，考国民党党义。第二场10点到12点，考国文。作文题目是《梦游清华园记》，对子题是“孙行者”。同寓的陈君作文，只写游清华园，想在最后点出是梦。时间到了，梦字没出现，收卷了，非常懊丧，所以下午我们都不考了。

我对对子对的是“胡适之”。当时听说答胡适之者有3人，我识其中1人，就是周祖谟，另1人不知是谁。标准答案应是“祖冲之”。祖、孙相对，平仄皆合。胡字不合平仄，字义也不对。近10年来，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几次提到这件事，想不到一件小事竟流传了60年。

问：这个题目是陈寅恪先生代清华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先生出的。陈先生给刘先生论国文试信，收入《金明馆丛稿》二编，编年误为1933年。《丛稿》附录了陈先生1965年识语，说：“寅

恪所以以‘孙行者’为对子之题者，实欲应试者以‘胡适之’对‘孙行者’。盖猢猻乃猿猴，而‘行者’与‘适之’意义音韵皆可相对，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”。陈先生可是认为您的答案是标准答案。

答：那是各人看法不同。

现在回到原来的话题。当时北大报考只分院，不分系。开学时入系有一些条件。必须国文、英文加起来够120分才能入国文系。我的国文70多分，英文只得24分（只有一个题目，把《杜子春传》译成英文），不够分数。就这样我上了史学系，并且以史学为终生事业。

问：请您介绍一下您在北大的学习生活。

答：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，文学院院长是胡适，史学系主任是陈受颐。

全北大有800多学生，我这一届招的新生大概240人。

一年级时我住在北大三院，在北河沿，现在好像是民政部。5个人住一间大屋，铺位之间同学自己用布幔隔开来，可以不相往来。上课在红楼。

教我们先秦、秦汉史的是钱穆，魏晋南北朝史和宋史是蒙文通，辽金元史是姚从吾，明清史是孟森。

问：听说您在北大期间参加了潜社。

答：1933年秋末，在椅子胡同北大四斋杨向奎的宿舍开了第一次会，还有胡厚宣、王树民、孙以悌、高去寻等同学参加。商定每周（大约是星期五晚上）聚会一次，切磋学问。我们出版过两期《史学论丛》，我的《猎碣考释初稿》就发表在第一期上。《论丛》是在北大印刷的。1936年我毕业后到史语所，北大印刷所负责人李续祖还写信给所长傅斯年告我的状，催我交印刷费。其实那时印刷费收得相当便宜，《论丛》厚厚一册，几十元。

问：史学界传为美谈，说胡适当年讲文学史，不知道《封神演义》的作者是谁，您当场站起来告诉他，是明代的陆西星，胡适大为佩服。请您谈谈具体情况。

（张先生好不容易找出1936年7月12日出版的《独立评论》第209号给我看，上面载有他和胡适就《封神演义》作者的通信。）

问：这应该是最权威的资料了？

答：是这样的。

（我翻看通信。张先生在6月8日给胡适的信上，一开头就写道：“本年以史学系功课甚忙，未获修先生文学史课程，时以为憾。昨晚与同学李光璧君闲谈，得悉先生近讲晚世章回小说，对于《封神演义》作者究属何人，曾询同学如有意见可率尔以对”。）

问：这封信可以证实，您当时既没有选修胡适的课，也未去听讲，当然不可能在课堂上当场回答胡适的问题了。

答：是。当时我已是四年级，快要毕业了，宿舍已搬到红楼北面的新楼。有空就到别的宿舍去串门。李光璧是文学系学生，河北安国人，比我低一级，住在东斋。我们比较谈得来。他后来搞历史了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死在天津，当时还住在地震棚里。

问：我看您给胡适这封信，不但指出无名氏《传奇汇考》中所说《封神传》“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”，“元”是“明”之误；而且又引嘉庆《扬州府志》、咸丰《兴化县志》，证明陆长庚就是万历年间兴化的陆西星。您当时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，又是学历史的，怎么对古代通俗小说也这样熟悉，而且这样快就做出回答？

答：我用一天时间写出这封信，也不算快了。后来我在扬州买了一部陆西星的《方壶外史》。抗战期间入四川，对陆西星这个人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他在道教中发展了一派，在四川有很大影响。但这是后话了。

问：胡适在6月10日给您的回信中说：“我写此信，只是要谢谢你的指示。你若不反对，我想把你的原信送给《独立评论》发表。”这大概就是《独立评论》发表你们通信的原因了？

答：《独立评论》是没有稿费的。通信发表后，送了我几张书券，可以领几期《独立评论》。书券的背面还印着“秀才人情”4个大字。

问：您从北大毕业后就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请谈谈中研院和史语所的情况。

答：1936年毕业后，我和同班同学傅乐焕一起到史语所任图书管理员。

榆关事变以后，史语所的一部分就从北平搬到上海，在曹家渡廉泉、吴芝瑛的万柳草堂。搬了100箱档案。历史组的人大都去了上海。后来又搬到南京。我们去的时候史语所已迁至南京。中研院在鸡鸣寺盖房子。我们住的宿舍楼原是竺可桢的，他去杭州就任浙江大学校长，就把房子卖给中研院。这座楼两层，上、下各3间。蔡元培院长家在上海，他来南京时就住在楼上。楼下3间就住我们这些单身汉，陈槃、周一良和我等等。现在想起来也真不容易，蔡元培当时是第六大院长。

问：怎么叫第六大院长？

答：当时的国民政府有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监察、考试五院，还有一院就是中央研究院。我们都是大学刚毕业、初出茅庐的毛孩子，同他这位大院长住楼上、楼下。

问：你们同蔡先生有接触吗？

答：他还是比较随和的。那时他经常写些条子让我和傅乐焕查资料，都是有关汪辉祖的。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用，有些资料是从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人名、地名辞典查的。后来才知道是为写《汪龙庄先生致汤文端七札之记录与说明》，这篇文章刊载在《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》中。

问：前几年我编注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，您给了我很多帮助。《书信集》中收了蔡先生1936年11月13日的一封来信，说：“前承示汪龙庄先生手札，并命做跋。读之觉适之先生一跋业已探骊得珠，所余鳞爪，未易着手，然又不敢方命而藏拙。顷已稍稍搜集一鳞一爪之材料，拟即整理成篇。惟弟有不情之请，拟以汪札胡跋及弟所附加之跋别抄一本，发表于张菊生先生之七十周年纪念册。如蒙允诺，不胜感荷。”这是指这篇文章了。

答：对。

问：您到史语所不久抗战就爆发了？

答：我1936年到史语所。1937年初曾到南浔看嘉业堂藏书。卢沟桥事变后，史语所就搬迁了。

第一站是长沙，暂住在圣经学院。1939年我到长沙还到那地方去看过，现在是省财政厅。一部分书放在衡山。

南京沦陷，史语所又迁离长沙。我负责图书的保管、押运。史语所共有中文图书12万册，西文图书1万册。傅斯年所长让我把书送到重庆。还将他的《性命古训辨证》一书手稿交给我，要我帮他抄写。和我一起运书的还有潘实君。我们租了怡和公司一条船，沿湘江穿过洞庭湖，先到汉口，又到了宜昌。在宜昌要中转换船，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，把《性命古训辨证》抄好。

1938年3月底到了重庆。在沙坪坝盖了3间房子做书库。初到四川，许多事情都觉得新鲜。比如我们的书库，墙不是用砖砌的，是夯土。

问：那就是古代的板筑了？

答：正是。还有妇女头上都缠白布，越有钱的人家布越新。我还奇怪，是不是因为抗战的关系，出了许多寡妇。后来才知道是当地的习惯。

问：史语所不是从长沙迁到昆明吗？

答：在那个动乱年代，兵荒马乱，逃难也没有个计划。像我们这样，也不知混到哪年哪月。是傅斯年所长让我把书运到重庆的。到了重庆，才知道史语所大部分人到了昆明。于是我在1938年7月初也离开重庆到昆明，这一路足足走了半个月。先在南岸的海棠溪等汽车。又在贵阳停了几天。“七七”上午在孔庙召开纪念抗战周年大会，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会上讲话，我也去听了。

史语所在昆明，分在靛花巷和竹安巷。罗常培、岑仲勉在靛花巷。陈寅恪先生也在靛花巷，同时在西南联大授课。我在竹安巷。

我在昆明住了两年半，送走了赵元任先生。

问：后来史语所为什么又搬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呢？

答：我想有两个原因。当时史语所搬到昆明，可能有一个考虑，通过越南可以同海外联系。后来越南被日本占领，这条通道被堵塞了。另一个原因是昆明的房子太小。

问：史语所是什么时候搬李庄的？

答：大约是1940年底。经由宣威、威宁、毕节、叙永到了李庄。

四川比起云南来，富庶得多。南溪县城在长江北，李庄在江南。一个李庄，当时就容纳了史语所、同济大学、营造学社、中央博物院等几个机构。房子都是楠木间隔，又高又大，顶得上北京的王府。

问：房东愿意你们住吗？

答：因为物价上涨，我们付的房租后来成了象征性的。但地主还是愿意让我们住。因为我们不住，军队也会来住，破坏就大了。

问：史语所在李庄的情况怎样？

答：当时史语所大约有六七十人。所长傅斯年经常在重庆，所务主要由董作宾主持。

问：我看到当时您写的《六书古义》、傅乐焕先生写的《广平淀续考》都是油印的。《史语所集刊》抗战期间几乎没有印过，许多是在胜利以后、甚至解放以后印的，是什么原因呢？

答：那时的物质条件很差。大家也无所谓，写出来就搁在那里，或者干脆不写。只有岑仲勉先生用力最勤。

问：您是怎样离开史语所的？

答：抗战后期，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，目的是呼吁保护沦陷区的文物，免遭破坏，如呼吁盟军不要轰炸北平古城等。委员会主任是李济，副主任是梁思成。我也是委员之一，负责图书，朱家济负责字画，……因为抗战结束得比较突然，也没有做多少工作。

抗战胜利以后，中国准备派一个代表团到日本，了解日军劫掠中国文物情况。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，在重庆集中。当时报纸公开登载过。后来“盟军最高司令官”麦克阿瑟不同意我们去，我一直留在重庆。

1946年2月5日，我从重庆飞到北平，回母校北大任教。从此离开史语所。

附录：关于封神演义作者的通信

适之先生道鉴：

本年以史学系功课甚忙，未获修先生文学史课程，时以为憾。昨晚与同学李光璧君闲谈，得悉先生近讲晚世章回小说，对于《封神演义》作者究属何人，曾询同学如有意见可率尔以对。学生谨案无名氏《传奇汇考》卷七《顺天时》下云：

按《封神传》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，未知的否。观传内燃灯，慈航，接引，准提，皆称道人；文殊，普贤，衢留，皆称元始弟子，其崇尚道家，疑必道家之作。但封神事属荒唐，而商周臣宰内中半实半虚，大略扭合装点，以伐纣为题目，蔓引释老，以封神作演义耳。

直言此书“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”，似有所依据，而以故事演进观之，其时代又失之太早。因疑“元”乃“明”字之误，盖即万历间兴化陆西星所做。长庚者，西星之字也。其人著述甚富，所做《南华副墨》（首有万历戊寅自序）最为有名，焦弱侯《庄子翼》多所援引，而《四库》不著录（入存目），今颇不易觐（浙江图书馆藏有万历刻本，见该馆馆刊四卷五期）。生尝于二十三年一月见一旧钞本，乃同乡吕某物，持至北平求售者，颇奇之。因尝留心长庚事迹。考嘉庆重修《扬州府志》卷五十三（人物隐逸）：

陆西星，字长庚，兴化人，生颖异，才识宏博，于书无所不窥。娴文辞，兼工书画，为诸生，名最躁。试不售，遂弃儒服，冠黄冠，为方外之游。数遇异人受真诀，乃纂述仙释书数十种。所注《庄子》尤盛行于世。（《兴化县志》）

咸丰《兴化志》卷八（文苑）：

陆西星，字长庚，生而颖异，有逸才。束发受书，辄悟性与天道之旨。为名诸生，九试不遇，遂弃儒服，冠黄冠，为方外游。数遇异人授真诀，乃纂述仙释书数十种。其《南华副墨》为近代注庄者所不及。西星于书无所不窥，娴文辞，兼工书画。同时宗臣最以才名，而著作之富独推西星云。

其著述见县志卷九艺文者：《周易参同契测疏》一卷，《老子元览》二卷，《南华副墨》八卷，《阴符经测疏》一卷，《张紫阳金丹四百字测疏》一卷，《金丹就正篇》一卷，《方壶外史》八卷，《楞严述旨》十卷（八种，《明史》入艺文志），《邑志》，《楚阳诗逸》（共十种，皆陆西星著）。见府志卷六十二艺文子部道释类者：《楞严述旨》十卷，《南华副墨》八卷，《方壶外史》八卷（陆西星撰）；《无上玉皇心印妙经测疏》，《黄帝阴符经测疏》，《老子道德经元览》上下卷，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测疏》三篇，《周易参同契口义》三篇，《崔公入药镜测疏》，《吕真人百字碑测疏》，《张

紫阳金丹印证测疏》，《庞眉子金丹印证测疏》，《邱真人青天歌测疏》，《元肤论金丹就正》三篇（陆西星测）。

皆可见其人娴文辞，有逸才，习金丹真诀，迷于道术，而又不废释教。故其《南华副墨》“大旨谓南华祖述《道德》，又即佛氏不二法门，盖欲合老释为一家”（《四库提要》语，子部道家类存目）。其思想与《封神演义》之称燃灯，慈航，接引，准提为道人；文殊，普贤，衢留为元始弟子，混释老为一谈，既崇道家而又不废释教者，正合。以是颇疑《演义》即西星所做。至于“元”“明”一字之差，或由笔误，或以传闻异辞，皆为可能。惟以更无它证，不敢遽尔断言。西星著述虽夥，今多不传。其《方壶外史》一种，似于近时某书目中见之，而印象模糊，不可踪迹。又《兴化县志》所称与陆氏同时之宗臣，有《宗子相集》。往者其邑人李审言（详）尝劝人与《南华副墨》同刻之（见《国闻周报》卷九第四十九期《凌霄一士随笔》）。今李氏早卒，书未果刻。其中是否有与此相关之记载，亦不可寻矣。文献无征，疑题莫释。谨书狂简之见，幸先生有以裁之。

学生张政烺敬肃 六月八日

政烺同学：

谢谢你八日的信。

这封信使我很高兴，因为前几天孙子书先生把《传奇汇考》的一段抄给我看，我不信“元时道士”之说，故颇不信此段记载，现在得你的考证，此书的作者是陆长庚，大概很可信了。

他的《南华副墨》有万历戊寅自序，戊寅为万历六年（一五七八），其时已在吴承恩（生约当一五〇〇）近八十岁的时候了。《西游记》必已流行。陆长庚大概从《西游记》得着一种 Inspiration，就取坊间流行的《武王伐纣书》（《全相平话》本，与今存之《列国志传》之第一册相同），放手改做，写成这部《封神演义》。

我那天在讲台上曾说：《封神》改本所以大胜于原本，只是因为作者是个小说家，能凭空捏造出一个闻太师来，就使纣方大大的生色，又造出一个申公豹来，从中挑拨是非，搬仙调怪，才有“三十六路伐西岐”的大热闹。

“三十六路伐西岐”似脱胎于《西游记》的八十一难。《封神》一榜似从《水浒》的石碣脱胎出来。但《封神》中的三十六路，一路未完，一路已起；十绝阵未全破，而赵公明兄妹等都已出场。其章法之波澜起伏，实胜于《西游记》。

陆长庚的年代，我盼望你有空闲时再向旧修的扬州志或兴化志一查，也许旧志能提及《封神》一书，而后人删去不提了。

我写此信，只是要谢谢你的指示。你若不反对，我想把你的原信送给《独立评论》发表。

胡适，二十五，六，十夜

（原载《独立评论》209号，1936年7月12日）

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记业师张苑峰先生

张守常

张苑峰（政琅）先生，1936年北大史学系毕业，即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。1946年北大复员，先生回母校任教，是年先生34岁，是当时北大史学系最年轻的教授。

先生首先给我们开的课是“中国上古史”。我选修这门课。于是有幸得见先生生平第一次上讲台的风采。先生衣着朴素，未留长发，戴深度近视眼镜。他把书包放在讲桌上之后，半晌没说出话来。拿一根粉笔转过身去，想先在黑板上写点什么，半晌又没写出字来。回过身来面向学生，又是半晌，终于艰难地说出了一句话：“兄弟不会教书。”先生是山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县人，胶东口音很重，“书”字音如“许”。当时社会上有些场合，讲话人表示谦虚，自称“兄弟”，但在学校里很少有人这样说，特别是老师对学生更没有这样说的。我只听张先生这么说过一次，大约先生自己也就这么说了一次。

当时在课堂上，我们学生并没有笑。后来在新年联欢会上，我出了个节目，模仿几位老师在课堂上的特点，中间就包括张先生第一次上课时上述艰难说出的第一句，我并没有再加以夸张，只是如实地模仿，大家都笑了。30多年以后，1979年在南京开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，到会的北大老同学有40多人，会外聚了两次，有人还点我表演这个节目，满场欢笑。

我以为，并不是同学们特别注意张先生第一次上课讲的这个第一句话，或是讲这个第一句话时的“窘态”，而是因为听张先生的课，越来越感到有分量，收获大，对张先生也就越来越尊重。认为受业于这样一位好老师是件幸事，于是也就对我的模仿有兴趣，唤起对张先生的亲切回忆。

张先生专心致志于读书治学，并不健谈，尤拙于世俗应对，以至于初次上课的开场白都不知怎么说才好。可想而知，他讲课时，语言也不流畅，嘴里来不及就多写在黑板上写。对于我们听课的学生来说，只要内容充实，至于是否“善讲”，并不重要。板书多，更有利于我们记笔记。

“中国上古史”这门课（也有叫“先秦史”的），是断代史的第一段，下一段接“秦汉史”。每周四小时，为期一学年，应该结束到秦始皇统一以前；然而到1947年放暑假这一学年结束时，连武王伐纣都还没有讲到。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开会为张先生庆八十寿，我在发言中讲到了这一点，引起一阵哄笑。然而且慢，如果让我们来讲，每周四堂课，也不许讲到武王伐纣，恐怕不必等一学年，半年不到就会没的讲了。古代的农牧业生产，稻粱黍稷，马牛羊、鸡犬豕，衣食住行，以及三皇五帝的传说与实际，可以考见的制度、信仰等等，引据文献，结合考古所得材料，旁征博引，讲得既丰富，又有说服力。若想到那时还没有解放50年来多了多少倍的考古发现，便会更觉得他把这门课讲得这样的丰富，不能不更加佩服（当时北大授课没有什么教学计划进度的硬性规定，学生也不那样要求）。

我还选修过他的另两门课：“金石学”和“中国史学史”。

记得上“金石学”课，他在黑板上写过好多金石文字，并上溯到甲骨文，还要说明有关的文

物制度，有时随讲随画出金石器物的形象，我都照摹在笔记本上，很有兴趣。我那份笔记，1950年代北京师院的贾善长先生（我上中学时的老师）借去，转给某先生做教学或科研的参考。我后来未治中国古代史，遂未急于索还，贾先生早已作古，那位某先生未见过面，也已想不起姓名了。若有那份笔记，再请人整理（我不能胜任），大约可以算是张先生的一部著作的。他当时上课只带几张卡片，没讲稿。

“中国史学史”，我的印象是实在。讲每种史籍的成书，其时代背景，著者情况，材料根据，体例异同，都讲得有根有据，考论精详。1952年上半年，院系调整前，张先生的老北大同学李光璧先生，时任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，向张先生找人开“中国史学史”，张先生推荐我。为此，张先生还陪李先生到宣南我的寓所去了一趟。大约张先生认为我学的还不错，但我心里没底。我问张先生：“我行吗？”他说“行”。我想有问题随时去向张先生请教，现发现卖，或许能对付得了。那时河北师院在天津，答应我一周去一次。但这只是临时办法，日后总得全过去，要离开北京，不免犹豫。后来又得到去辅仁大学的消息，这事就作罢了。但由此可知，张先生不我这个学生为不肖，时刻关怀着我的工作。

1950年代初，李光璧先生创办《历史教学》月刊，邀张先生入股以助其成。听说张先生卖了一套什么书交的钱，约定赚了钱再买书还他。张先生既参与了《历史教学》的创办，便也邀人写稿。我上大学二年级时即在中学兼课，这时在中学教书已五六年，张先生便找我写有关中学历史教学经验的文章。该刊创刊之初，登过我的几篇这方面的稿子，就是奉张先生之命写的。

我在师大女附中教“中国近代史”，因尚无适当课本，便自编提纲。在课堂上抄写太占时间，商请学校油印发给学生；反正不在课堂上抄写了，索性写得详细些，这就形成了一部油印教材。经张先生提议，由李光璧先生经手，以历史教学月刊社的名义出版，名《中国近代史纲要》。这是1952年的事。

1952年暑假，院系调整。原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，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柴德赓先生任师大历史系主任。柴先生原先要为“明清史”增添教学人员，所以曾向明清史专家、原北大史学系主任郑毅生（天挺）先生要人，郑先生推荐我。1953年暑假，我所在的中学也可以离开了。柴先生重申前议，我遂来到师大。适逢刚成立“中国近代史”教研组，我因出版过一本《中国近代史纲要》小册子，遂派我参加了这个组，从此，“中国近代史”遂成为我的终生专业。说起来，其中也有张先生关怀我出版那本小书的因素在内。

我刚到师大，还教了几年“历史教学法”，这也和张先生要我给《历史教学》写关于中学历史教学经验的文章有关。

由于张先生对我的经常关怀，在事关我的终生工作乃至遭际命运方面，可以说处处感到有他的作用或影响在内。现在常见人说“恩师”，我不轻易用这个词，但张苑峰先生之于我，可以说得上是恩师的。

张先生使我感恩的，不止上面说的这些，几十年来，向他请教，承他指点启迪之处甚多。兹再举一例：

1950年，有一次我到张先生家请教。说是请教，也不一定是带着什么问题去，但也不会是闲扯。这一次我说起了为在中学教历史课，搜集历史歌谣，通俗易懂，比引用其他文言史料容易使学生接受；而且这是群众的呼声，富有人民性云云。谈次，张先生从里间屋内取出一套线装书给我，说“你拿去看看”。此书名《古谣谚》，晚清杜文澜辑，曼陀罗华阁原刻本，搜罗经史子集